

《玉海》板刻及明、清修补考

丁志安

《玉海》为类书之一种，宋末鄞县王应麟撰。应麟（1223—1296）字伯厚、号厚斋、晚年又号深宁叟。淳祐元年（1241）进士、宝祐四年（1256）又中博学弘词科。官至礼部尚书、入元不仕。《宋史》卷四百三十八，儒林八有传。

《玉海》二百卷，分天文（李桓序作天道）、律历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避清帝弘历讳作律宪。）、地理、帝学、圣文（《四库提要》作圣制。）、艺文、诏令、礼仪、车服、器用、郊祀、音乐、学校、选举、官制、兵制、朝贡、宫室、食货、兵捷、祥瑞等二十一门。每门又分子目，共二百四十一类。（明末长山刘鸿训节录要语成《玉海纂》二十二卷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二十六。）

关于此书的撰辑过程，虽《王深宁年谱》有三（一、钱大昕，二、陈仅，三、张大昌编），皆无所记载。按应麟自跋云：“余幼好奇、耕猎词圃。丽泽西山、诒我抚万。北堂之抄、西斋之目。披华启秀、历历载腹。……”^①似自其少时即从事搜集，虽已成书，并未刊刻。稿藏于家，卒后被人窃去。其子昌世（1267—1327）报官，方得追缉复归。

考其书自元代至元六年（1340）初刻完成起，经过明代修补五次，清代修补三次，以至清嘉庆十年（1805）南京上元县学尊

经阁不戒于火焚毁无遗止，先后历四百六十五年。关于元代刻书缘起，明、清八次修补情况，以及刻后之迁移，各书所记载、评论，颇有不同。现据笔者所翻检的各种板本及各藏书家的不同记录，综合考证，叙述如下：

（一）元代刻板与修补

在王应麟之子王昌世报官追回《玉海》稿本之后，引起了当时士人们注意。国子博士赵承德以此书“纂辑百家，博综众理。用功精深，有补后学。虽尝传录于世，至今未曾刊行。”于至顺三年（1332）与庆元路士绅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权从仕等，先后向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建议，令所属学院在学粮内提款置备笔札，就其家中抄录。当时帅府都事牟应复主张“缮写校讎，将侵诸梓。”惜其事未行而牟已他调。元统二年（1334）二月由宪司分司牒下庆元路依议筹办。预计刊板工食等项需银七百六十三錠六两五分，在各路学院瞻养钱粮内分派支拨。委请铅山州儒学教授权敬叔、训导朱景陆及应麟之孙王厚孙（1300—1376）校正对读。所需款项分派庆元等七路学院赞助。但其事虽已布置，经过四年各路款均不见解到，至至元三年（1337）“尚未完就”。

后，新任浙江宣慰都元帅也乞里不花到任，闻知其事力行前议，征费于浙东各郡，县学及书院。委郡守张荣祖临莅提督，教授王荪（一作荪），学正薛元德董其役。并刻《辞学指南》《诗考》《诗地理考》《汉艺文志考证》《通鉴地理通释》《汉制考》《集解践阼篇》《康成易注》《姓氏篇》《补注急就篇》《王会篇》《小学紺珠》《六经天文篇》《通鉴答问》等十四种，历二年而后成。郡绅胡助、李桓各撰一序，薛元德、王厚孙又各撰后序，②附刻当时公牒《玉海指挥》及协助人员名单一份。

据王厚孙的跋语他虽负有“校正对读”之责，但所校出来的遗误，而董其役者（似指薛元德）为求速成并未修改。以致其所

遗所误，却依然存在。至正三年（1343）有御史某人奏闻，命宪司檄所属访求其缺，得知前帅府都事牟景阳（即牟应复）在浙时曾有抄本。遂令部山书院山长王士贵同王厚孙前往钞录。适值此时有部使者杨某来到四明（今宁波市），乃命庆元路儒学教授天台朱文刚选人缮写校讎，招工补刻《兵制》六卷（文刚有跋见《玉海》卷一百四十一卷尾）。

嗣又历六年，至至正九年（1349）庆元路总管阿殷图（别号野堂）来守四明。公余之暇因往观郡学藏书，发现新刻《玉海》仍有遗误存在。又于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命王厚孙及儒学正王介重加校对，查出漏误六万多字，再行招工修补，阿殷图与王介又各撰一序（按此二序见清人陆心源《丽宋楼藏书志》卷六十一。康熙修补本《玉海》卷首为明嘉靖、万历补刻。乾隆修补本及嘉庆重刻本均未列。）王介序有云：“至正己丑春，太守嘉议公（谓阿殷图）来领是邦，虽郡事鞅掌，必时造论堂，而扶衰拯弊加于昔士君子赖焉。今年夏，因阅《玉海》数百卷，于鲁鱼亥豕之谬，命参校而正订之者数万言，使学者无惑于讨论。……”以上为元代刻修之经过。

后来各家所藏元刻《玉海》，大抵皆为此本。仅聊城杨以增（1787—1855）《海源阁藏书目》注明“至正本《玉海》口口卷，二百册，二十函。”余如丁丙（1832—1899）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二十。陆心源（1834—1894）《丽宋楼藏书志》卷六十一。瞿鏞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七皆作元刊本。又独山莫友芝（1811—1871）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卷十云：“至元元年庆元路儒学刊《玉海》并附十三种，半页十行，行二十字。并仿赵（孟頫）体书，元印、棉纸、宽大者，极精美。丰顺丁禹生（日昌）有之，少附刊诸件。”亦不详其刊刻与修补的经过。

（二）明代南京国子监藏《玉海》书板，有无浙刻所存的问题

关于明代南京国子监所藏《玉海》之板，其中有无浙刻移来者，后世各家有不同的说法。明正德二年（1507）二月南京国子监监丞戴鏞补板时并作跋云：“右《玉海》凡二百四卷（包括《辞学指南》四卷）合五千板，岁久漫漶残缺，观者病焉。鏞董修群笈、次第及是，补遗易腐，新刻总四百三十五板，庶完其旧。……”（见康熙二十六年补刻《玉海指挥》第六页，嘉庆刻本削去。）按戴跋语气，并不是完全为明时南京国子监所刻，甚为明显。又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七月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（1535—1596）跋云：“《玉海》一书，篇帙繁浩，独南雍自国初时有刻本，岁久朽蚀者过半。”亦仅言明初南监有刻本，并没有说此书之板皆南监所刻。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江南学院吉水李振裕序云：“书刻于浙东，元至元六年始成，计五千板，号乃踰万，明初南监亦有刻本。”这是李振裕已怀疑浙刻与南监不是一种刻板，但仍未曾断言。但同时他的门人宝应王式丹（1645—1718）等撰写《玉海例言》有云：“元时刻于浙东，原本已无传，明代刻本藏在南雍。”则很显明的将元刻明补之板，分作元、明各刻。未免武断，乃未加研究所致。又乾隆三年（1738）李振裕之甥南昌熊本序云：“但《玉海》著自王厚斋先生，历元、明而废缺失次。”同时江宁知府广川（今河北景县）张华年序云：“书成于宋、镂板于元，其在江南者板藏上元学中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二十六，子部，类书类一云：“其书元时尝刊于庆元路，板已久佚，今江宁有南京国子监刊本。……”以上各家所说不一，惜皆纸上空谈，未曾细加核实。其实在乾隆时板尚未毁，并不难详加研究。

据我所见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补刻印本，其中尚有字仿赵体，书口上为字数而无年份，当属原刻。有的只存上半截，下

半截补板字体不同。有的中间裂痕，很为明显。而明自正德元年（1506）补刻，皆有所补年份（成化补刻无年份）。莫友芝云：“成、弘后板归南监。”按“成、弘后”三字尚嫌稍晚，考证见下。杨守敬（1839—1914）云：“元刊板，明尚在南京国子监，自正德、嘉靖重修补板。”（见《丛书举要》卷十五）杨守敬之说可信，非上述诸家未曾核实者可比，足证南监最初之板，实自浙江移来，毫无疑问。

（三）明代递修五次

据上文所述明初南监藏《玉海》书板，确是自浙江移来。南京所刻，皆属补修。莫友芝“成、弘后板归南监”一语，是未曾注意到该书卷二十一及卷一百五十三末尾有“成化八年本监刊补《玉海》完日印制备用”十六字。则“成、弘后”三字应易为成、弘前，或成化初方较适合。兹将明代递修五次，分述于下：

1. 成化八年（1472）所补，是为明代递修第一次，惜无序跋记载，以及书口刊刻年份，致多数收藏家都未曾注意到上述之十六字。

2. 正德元年（1506）及二年（1507）所补，既有戴鏞之跋，而书口上均有“正德元年补刊”或“正德二年补刊”等字，下有刻工名、字仿原刻。

3.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至三十六年丁巳八年中所补，为明修第三次。庚戌年补多数只有年分而无人名，惟卷二十四第二十二页有“监生朱邦雋刊”等字。乙卯年补题名最多皆为监生某人，姓名有徐垚、王九思等二十余人。丙辰年有陆径、赵祖绂，丁巳年有赵祖易等各数人。惜无序跋记载，大概是由本监监生分任其责。

4. 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癸未至十七年（1589）己丑补刊。书口上既有“万历癸未年刊”“万历癸未年补刊”“万历丁亥年”

及“万历十六年”“万历十七年”等字，又有“大明万历十一年重修玉海书”王弘海等题名一纸，及万历己丑赵用贤跋后题名一纸。似皆为此数年中对补修《玉海》有所贡献之人。

5. 崇祯所补，无序跋可考。书口有崇祯丙子署笈厅赖补刊，或东厢王、南厢周、助厅韦等及崇祯丁丑南厢管查刊等字样，数亦不多。以上为明成化、正德、嘉靖、万历、崇祯等修补情况。

（四）清代递修三次及嘉庆重刻

1. 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李振裕补修。自明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至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又近一百年。中间虽经崇祯丙子、丁丑小修一次，无如清初南监改为上元县学，管理者保管不善。以致至李振裕督学江南时，又已朽蚀过半。乃委托松江知府朱雯、上元训导陆澹再一次大事修补。计补缺板三千一百六十，其文字漫灭者皆依善本补刻。工竣时李振裕也撰一序，门人王式丹等又写一《补刻〈玉海〉例言》。《例言》中有几则可资考证者，今摘录于下：

吉水李夫子奉命视学江南，兴起文教。课士之暇，网罗旧闻。深惧是书失传，因捐学租补刊，总计全部九千余页、今补六千一百余页。刻成刷印，复得朽坏者一百五十余页，悉皆补完。附书十三种、都无遗缺。较前代所刻，焕然改观。

宋时极重庙讳，是书中引用古人名姓、事迹，遇讳即嫌名、亦必改易字面。如桓谭之为亘谭、荀勖之为荀勉、魏徵之为魏证，及贞观作正观、胤征作嗣征、宫悬作宫垂、桓圭作植圭，姤卦作遇卦、此类颇多，与讹谬者不同。且改之不可胜改，故皆仍其旧。

古字多有通用，如藏之为臧、镇之为填、执贲之贲作摯、苍龙之苍作仓、袞龙之袞作卷、斧戾之戾作依、崆峒作空桐、皋陶作咎繇，此类难以枚举，皆原本经史，不敢妄改。

明代补刻，万历本最精，字画皆古雅可观。嘉靖、崇禎本次之，正德本最为纒繆。其不著年代者，初刻本也。卷中存者已无几矣。今校正既毕，必当挖补。新板自可无虑，旧板历年既久木质不坚，以新木补入，始犹相附丽。一经刷印、水浸之后，或风吹霉湿，旧木易于腐坏、新木易于拆裂。所赖典守者加意度置、时为查点，庶可保全字画，久而勿敝。

2. 乾隆三年晏斯盛等补修。在李振裕大事修补之后，又五十年板复朽蛀残缺，江宁布政使晏斯盛，按察使孔传焕、江宁知府张华年等同谋捐资“补残整旧、粹然完璧。”板心上有“乾隆三年刊”下有“泗州知州王文煜补刊”“永城县知县顾斌补刊”以及知州龚懋勋、龚元忠、谈任龙、吴定国。州同李元馥、高官保、吴永锡、彭文焕，同知汪正、举人吴斌等补刻字样，分见各页。有张华年及熊本二序。

3. 乾隆五十六年补修。在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合河康基田（1728—1813）来到南京继任江宁布政使，其时上距乾隆三年、又逾五十年。检视书板，于第三年（乾隆五十六年）又小修一次。其所补之板，板心上刻“乾隆五十六年刊”下刻“上元训导毛藻校”无序无跋。按《同治上江两县志》卷十三，职官，上元县，训导，误列毛藻于嘉庆间任，后之修志者可据此改正。

4. 嘉庆十年板毁，十一年重刻。在乾隆五十六年康基田、毛藻等小修后又十五年，至嘉庆十年（1805）夏天贮藏《玉海》书板的上元县学尊经阁，不戒于火，将保存、递修近五百年的《玉海》书板，烧得一片不存。其时适值康基田又到南京复任，虽近八十高龄，却还有雄心壮志，慷慨解囊，竭力贡献。不仅修复尊经阁，更添建东西学舍。并延请上元副贡陈勉甫，廩生胡圣几入署，供给膳宿。以江宁知府张敦仁所藏至元初刻本《玉海》参考经史各书，往复讎校。补填二万余字，招工重刻，经五个月

竣工。基田撰序款题“嘉庆丙寅立春后三日合河康基田书于江宁藩署之清畏轩。”新刻之书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，板心刻书名卷数。卷首康序外并刻《玉海指挥》及胡助、李桓、赵用贤、李振裕、熊本、张华年等六序。板心无刻工、字数，字亦不仿赵体，不似原刻之古色古香。

（五）结语

综观上述情况，是《玉海》原书成于宋末，元初有传抄本。元至元三年（1337）刻于浙东庆元路、（今宁波市）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又补刻六万余字。明代初年将书板移存南京国子监。其后修补情况之可考者，自明成化八年（1472）起，至清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三百二十年之间，共有八次。此书向为历代学者所重视，都认为是我国一部较详善的类书。南京国子监入清改为上元县学，板藏该署尊经阁中。不料至清嘉庆十年（1805）全部书板，焚毁无遗。现在一般流传的多为清嘉庆十一年（1806）康基田重刻本，对字数、刻工以及监刻人员皆无纪载。

笔者工作余暇尝以各次补刻之本，逐页翻检，互相核对。（各次刻本对各家序跋附录的排列、取舍，也有所不同。）并翻阅阅读后世各藏书家对本书评论、著录，发现各不同情况细加考证，缕述如上，谨向诸位学者、专家和前辈请教。

注

①②见附刻《诗考》卷首。